



繆達爾的經

當代最傑出的瑞典經濟學家之一的繆達爾(Gunnar Myrdal, 1898-1987)是於一九二三年在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大學法律學系畢業後才決定仍在原校研究經濟學的。當時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瑞典經濟學界的聲譽發展到很隆盛階段。其中從事教學的師長可以說都是一時之選。例如譚維生(David Davidson, 1854-1942)仍在安卜沙拉(Uppsala)大學任教。卡塞爾(Gustav Cassel, 1866-1944)以及較他年輕的赫克雪爾(Eli. F. Heckscher, 1879-1952)和貝奇(Costa Bagge, 1882-1951)則都在斯德哥爾摩執教，當時正是他們的學術成就到達尖峰的時分。至於最卓越的威克賽爾(Knut Wicksell, 1851-1926)雖然已於一九一六年在倫德(Lund)大學退休，但當時仍遷居到斯德哥爾摩來與經濟學界保持密切聯繫。後來他於一九二六年逝世了，他所遺留下來的輝煌的學術傳統則正發揮出萬丈的光芒。繆達爾能在這種環境中去接受他的經濟學的教育，不待言，是很幸運的。那麼，他究竟從以上諸氏身上學到些什麼呢？究竟得到多少裨益呢？這最好是從他自己的敘述中去求解答。他在所著的「社會理論中的價值觀念」(Value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58)一書中寫了一篇「跋」，本文之作大部分就以該「跋」為依據。其中用引號所寫出的都是出自該文。

首先要提到的是魏克賽爾，雖然他在繆達爾沒有進入研究所之前就已逝世，所以沒有直接親聆他的教誨，但就繆氏一生之發展論，魏克賽爾恐怕對他影響最大的人。一般地說，魏克賽爾是與邊際革命的人士以及馬夏爾諸氏同輩的人，但他之轉入經濟學的研究是在他生命的後期，因此他就能利用他們的著述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而能開創一個新的方向。雖然他的經濟理論是與華爾拉以及奧國學派一樣的純粹，而且比馬夏爾的還要純粹，但他對於一些社會爭議性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討論都很樂予參與，而且常有與眾不同之主張的提出。實際上，就正由於他有這種興趣，乃使他於一八八五年以後要轉而從事經濟學的研究，那時他已獲有數學與自然科學的學位了。他所注意的問題極為眾多，如酗酒問題、娼妓問題、婚姻問題、言論自由問題，君主制度問題等等都是他所關心的。但最主要的是人口問題，他認為這是所有問題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對